

淡泊寧靜的教育家

林振春

——孫邦正先生

孫邦正先生，字友豪，安徽省宣城縣人，民國二年三月廿八日生，幼承家學，嘗以昔賢嘉言懿行爲楷模；早歲而孤，練就獨立堅毅不撓的個性。先生聰明穎悟，初高中皆以第一名畢業，曾獲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歷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國立湖南師範學院教授兼系主任。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應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之聘，由漢口携眷來臺，任教育系教授。民國四十四年前往美國哥大進修高級學位，四十五年返國主持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延攬名師，認真辦學，因而學風淳樸，學生素質頗高，其畢業生頗受社會讚譽。五十八年八月兼任教育學院院長。任教迄今，已歷四十餘年，並曾任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對於中國教育制度之改進及九年國民教育之推行，諸多建議，貢獻良多。教育部歷次修訂重要教育法規及大中小學校課程標準，先生均應邀參與其事，竭智盡慮，以求允當。此外，對於教育學術活動之倡導，亦不遺餘力，歷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國際教育研究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中國社會教育社常務理事。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老師的老師

民國七十年三月的某個早上，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的幾位教授先生，在系辦公室談論各自的師生隸屬關係，發覺在短短的廿六年之間，社會教育系已是「五代同堂」，而孫邦正先生就是他們的共同「老師」。經歷四十年的粉筆

生涯，這位慈愛溫煦的「老師的老師」，仍然保持着教育家的純樸本色，為教育奉獻出他的智慧和熱忱。

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筆者拜訪孫先生和平東路的寓所，簡樸的客廳內，除了一套沙發、一架電視，就是琳瑯滿目的「春風化雨」匾額，整齊的排列、細潔的佈置，透露出幾許的清爽與平易。先生親切地為我沏上一杯清茶，便引導筆者進入時光隧道，神遊民國初年的安徽宣城。

書香盈室的幼年生活

宣城位居青弋江下游，為皖南的風景名勝，自古即為詩人墨客吟歌流連的處所，流風所及，居民多以詩書禮樂作為生活的典範，在此種優良環境的薰陶下，培養出先生淡泊優雅的襟懷。

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為前清的舉人，因此，早年的學業，除了五歲那年到私塾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外，六歲起就在祖父的教導下研讀論語、孟子，並開始練習作文。十歲至十一歲間，在父親的妥善安排下，延請教師到家裏教導英文和算術，十一歲時便考上了當地最著名的初級中學——皖南中學，開始了先生正規的學校教育，也埋下了日後獻身教育事業的種子。

皖南中學是一所私人辦的教會學校，學風淳樸，師資設備均佳。校長是位留美的教育家，作風開明，非常親近學生，頗受學生愛戴。

「校長極為重視學生的課外活動，在課餘時，常與我們一起唱歌、繪畫、閱讀及做各種活動，而且他還建立了一項補習辦法，利用暑假，為學生開班補習英文和數學，對學生幫助很大！」

將近六十年前的往事，先生仍然記憶深刻而且充滿感激！原來剛進入中學時，先生在私塾一年所學的英文、算術根本趕不上進度，校長就在暑假開班補習，為沒有唸過英文、算術的同學補習。先生在一個暑假的苦讀之後，獲益良

多。「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我的英文和數學的成績，不但迎頭趕上，而且還名列前茅。」

如同謙虛的人，把成功歸諸他人，先生總不忘把自己的成就歸之於中學時代師生融洽的相處，進而以有生之年，為教育事業而奉獻。先生常樂道其學生生活的三件大事：第一是中、小學時代奠定了良好的語文根基；第二是中學時代，師生之間融洽的感情，啟發了作育英才的理想；第三則是大學時代自由研究的風氣，培養出「學不厭、著不倦」的精神。

刻苦自勵的少年經驗

先生之尊翁益卿公，性情豪邁，樂善好施，對於慈善事業最為熱心倡導，很得地方民衆的贊譽，尤其賦性至孝，雖然所主持的宣邑銀行業務非常繁忙，而對於父母晨昏定省的禮節，從來未曾怠忽。民國十五年夏季，當地發生了流行的瘟疫，益卿公不幸逝世，先生的母親為此悲慟萬分，亦於同年八月病逝。在先生的自傳中，先生很沈痛的記下這段遭遇：「余年方十三，迭遭變故，唯有與諸弟妹相顧慟哭。」

在父母雙亡的情況下，先生身為長子乃負起照顧兩位弟弟及兩位妹妹的責任，其刻苦自勵的景況可想而知。幸虧當時仍是大家庭，祖父母仍然健在，先生就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另外加上伯伯叔叔的多方護持，也才不致影響到先生的學業。

崢嶸頭角的求學生涯

先生於民國十六年七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皖南中學，十七年春季考入安徽省立第四中學高中部，由於國文、英文與數學的底子很好，因此每學期都以第一名獲得獎學金。民國二十年一月，以第一名畢業。當年八月，考入在南

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那時沒有聯招，各大學單獨招生，報考中央大學的人數相當踴躍，每年錄取也不過才五、六百人，所以競爭相當激烈，大概能夠考上中央大學的，都是一時之選。」

當時中央大學教育學院承繼南高東大的學風，所有的教授，都是一時的彥碩。

「像當時的教育家艾偉、程其保、蕭孝嶸先生，主講中等教育的汪懋祖先生，比較教育的孟承憲先生、羅廷光先生，教育行政的夏承楓先生以及教學法的趙廷爲先生，這些名家學者，當時都集中在中央大學。」

先生流暢有序地談論當時的名師，如同這些名師昨天仍在課堂上教導先生一般，事隔半個世紀而仍栩栩如生地活在先生的記憶中，若非先生的記憶過人，定是師生之間擁有極爲深刻的情感。

「我們當時學術研究的風氣很盛，大一開始便開創寫作投稿的嘗試，當時的學術刊物，甚或報章雜誌都有我們的文章出現。」

「這當然要歸功於教授的鼓勵，我們常在一起探究問題、辯論學術，教授們甚至還把我們的文章推薦給各報章雜誌發表，這當然更刺激我們寫作的興趣！」

「所以我認爲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教授們鼓勵的態度，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先生很謙虛地把成就歸諸於教授的教導，我們卻不能忽略以圖書館爲家的苦讀生涯。

當時的中央大學有很濃厚的研究風尚，學生常常以圖書館爲家，先生就是其中最爲傑出的一位。常常，他一個人埋首書中，並且將平時閱讀及研究心得，寫成論文，發表於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教與學、江蘇教育等雜誌。所譯美國教育家克伯屈 (W. H. Kilpatrick) 的「教育的新領域」(*Educational Frontier*) 也在第四學年出版。

最值得記憶的是有一次，他刊在「江蘇教育」上的一篇文章「中美中學教育比較」，經上海申報轉載，申報在文章後面加上一段讚語，行文間都稱呼他爲「教授」，事實上，先生那時祇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顛沛流離的教學生涯

先生於民國廿四年六月畢業於中央大學，同年八月，考入中大教育研究所，該所由文偉博士主持，以學科心理學的研究為主，先生在此受到嚴格的科學研究方法訓練，對其以後的學術研究助益甚大。

廿五年七月畢業於中大教研所，經由文偉博士的介紹，就任陝西省教育廳編陝西教育月刊。這個工作並沒有維持多久，十一月間，西安事變發生，陝西省陷於恐怖狀態，局勢極爲混亂，先生乃辭職返京。於十二月底就任中央大學心理系助教，這個工作仍然沒有維持太久。廿六年七七事變發生，中日戰爭爆發，中央大學籌議遷到四川重慶，先生乃回到家鄉安徽，應聘爲安徽省立徽州師範學校的教導主任。這個工作維持半年，日本的飛機又來轟炸，學校疏散到鄉下去，先生乃決定攜帶家眷往大後方遷移。因之，一路搭車、搭船從安徽到南昌到長沙到貴州進入四川重慶。這一路的艱險，在先生輕描淡寫的一句：「在鄱陽湖上看到日本飛機在轟炸！」就讓人體會到戰爭時生活的緊張。

一到重慶，在老同學的推介下，應聘四川省立川東師範學校的教員兼附屬小學的校長。

「這一年小學校長的行政工作經驗，對我幫助很大。尤其是使我對小學教育產生相當的興趣和瞭解！」

「所以很多工作，你如果認真去做，總可以獲得很大的收穫！」先生總是細心地把他寶貴的心得，隨時隨地的告訴我們。

廿八年八月，中央大學設立教育研究所，由文偉博士主持，乃找到先生幫其主持教育研究所的所務工作，名義是助理研究員，先生得以繼續學科心理學之研究工作。

三十年八月，經由恩師趙廷爲主任的極力邀請，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專任教授，其時，社教系學生素質頗高，如現任師大教育學院院長雷國鼎先生就是社教系第一屆的畢業生。

在重慶這段日子裏，總計在川東師範學校一年、中央大學二年、四川教育學院五年，剛好是八年抗戰的時期，當時的生活非常艱苦。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景，最使他難忘的是：教師穿的是藍布袍子、棉內衣，腳登布鞋；吃的是八寶飯，飯裏有砂子、石子、稗子……等，可是大家的精神很旺盛，上下一心，那種堅苦卓絕的民族意識，是值得今天在富裕物質環境中生活的人們加以學習效法的。

先生更特別提到「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偉大從軍報國行動，更可看出當時民族精神教育的成效。

抗戰勝利後，學校復員，先生並未隨中央大學回到南京，而應國立湖北師範學院之聘，任職教育系主任。當時匪共猖獗，湖北師範學院由長沙遷到漢口，適湖南師範學院在南嶽衡山復校，亦邀請先生前往任教。於是先生便開始了一個月在漢口，一個月在衡山的兩地奔波教學生涯，工作的確相當忙碌，精神上仍覺相當充實，祇是物質生活相當緊張，最主要的是當時貨幣貶值的情形相當嚴重。

「舉個例子，學校早上發薪水，第一件大事就是趕緊到市場，把法幣（紙幣）換成銀元，十點鐘以前可以換到十二塊銀元，若到下午，可能祇換到十個銀元！」

此種貨幣貶值的嚴重情形，在今天想來，先生仍留有餘悸，而物質生活的艱苦，也就使得教師必得兩地奔波，兩校任教，才能維持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

卅七年底，大陸上赤燄遍地，蔣公被迫下野，徐蚌會戰又失利，大陸情況極為險惡。先生接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先生及教務主任林本先生的聘書、路費及一個月的薪水，有感於這一份長者的誠意，先生乃離開漢口，經廣州、廈門到達基隆，而來到了臺北，結束了在大陸上流離遷徙的教學生涯，開始為臺灣的師範教育投入畢生的心血。

前往美國進修

卅八年至四十四年，先生一直任教於教育學系，在四十四年夏天，師範學院與美國在華合作總署有個合作計劃，選派大學教授前往美國進修。因之，經由院長劉真先生的安排，先生於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做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而研究的主题，使得先生日後與社會教育系結下不解之緣。

我國自民國肇造，即十分重視社會教育的推行，惜因國家多難，以致推展不易，成效不彰。政府遷臺以後，有感於社會教育的重要性，加以當時社會中心教育的論調甚囂塵上，身為師範學院院長的劉真先生，乃安排先生前往美國詳加研究，以作為在我國推行的指導。當時研究的主题，經先生說明有如下三個重點：

- 一是社會中心教育的制度如何確立，也就是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應如何配合？
- 二是社會中心教育的內容如何訂定，也就是課程的發展與安排。
- 三是有關教學方法的革新。

先生不但致力於社會中心教育的研究，並考察了美國各地的教育。回國之後，所出版的書籍，有美國教育、美國教育鳥瞰等；所撰述之論文如美國師範教育的動向、美國白宮教育會議紀實、美國師範教育概況……等都是以深入淺出的筆觸，探討美國教育的優劣得失。提供我國教育決策單位的借鑑。

主持師大社會教育學系

民國四十四年，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第一任校長劉真先生有感於社會教育的重要性，乃成立社會教育學系，並決定邀請在美進修的先生主持系務，第一年暫請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先生代理系務，現任教育廳長施金池先生

即為當時的第一位助教。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先生由美返臺，八月便正式接任系主任之職。因為社教系初創，無常規可循，課程內容與教育系無甚差別，倒是選修課程五花八門，包括有圖書館、新聞文學、音樂、戲劇、舞蹈等。因此，社教系學生難免無所適從而頗覺徬徨。先生認為社會教育系應有其創系的特色，經與田院長、施助教商議結果，決定先確立訓練方針，根據方針決定分組，根據分組修訂課程，根據課程延聘師資等幾個步驟來加以改革。

「我當時認為社會教育為配合社會的發展，應該分為幾個途徑，分頭來推展社會教育。」

「首先，我認為傳統的社會教育以圖書館為主體，圖書館較容易設立、發展，也較容易為社會所接受，所以決定成立圖書館組。」

「第二方面，我們有感於大眾傳播工具的影響甚大，尤其是報紙、電視與廣播，其所發揮的威力比傳統社會教育機構的力量大很多，所以應該把它歸入社會教育的系統之內。」

「第三方面，我認為整體的社會福利、社會安全措施的建立，也是社會教育的責任之一，在民國初年晏陽初先生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及梁漱溟先生的鄒平農村建設實驗都是屬於社會教育的工作，所以社會建設與社會教育是互為表裏的，從事社會建設、社會工作人才的培養，當然也是社會教育系的方針之一。」

在這個原則之下，先生便開始對課程加以大刀濶斧的改革，首先減少共同必修科目，接着便針對各組的需要，加開分組選修課程，以培養學有專長的人才。

「延聘師資也是當時最重要的工作，更是不容易做好的工作。」

當時教師員額編制一班祇能有三位，而社教系分三組，三組各有專攻，很難聘到三樣俱精的學者，這個難題當然由先生負責解決了。

先生決定在低年級多用專任教師，高年級多用兼任教師來解決此一問題，因之，當時許多學者名流與在這三方面有重大成就者，幾乎都被延聘到社會系任教。

「當時師大是金字招牌，不少社會名人介紹師資到社教系來任教。不過我總認為師資應以需要為主，以人才為準，介紹來的不一定採用，倒是著名的學者，一定要登門禮聘，或透過種種方法加以延攬。」

「在這個原則之下，當時甚多專家學者齊聚社教系，在圖書館學方面有蔣復璁先生、王振鶴先生、版本目錄學的昌彼得先生及楊家駱先生等等。」

「在新聞學方面有當時新生報社長謝然之先生、聯合報于衡先生、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歐陽醇先生及政大的王洪鈞先生等。」

「在社會專業組方面有社會學家謝徵孚先生、社會心理學家郝繼隆先生、保險學家王克先生、退輔會的趙聚鈺先生等專家名流。」

廿五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如繪地浮現在先生的記憶之中，回想創系的艱難，而如今的滋長茁壯，一絲的辛苦，十分的喜悅，流露在先生灰白的髮際與溫煦的臉頰，而先生仍歸功於教授們的用心教學與同學們的奮發自強。

可是當我們深入瞭解創立之初所受到的批評與反對，能不對先生的高瞻遠矚與堅毅剛忍肅然起敬！

當時很多人認為政府祇辦學校教育，師範大學是培養學校師資的機構。至於社會教育是私人的事業，政府無須多加干預或投資。這種看法我們現在會認為太狹隘，很可笑，可是當時卻形成一股反對的聲浪。不但校外人士如是批評，就是校內的教授與系主任也難以諒解，先生當然首當其衝。

「當時是因為風氣未開，很多人對社會教育系所負的使命之重要性不甚瞭解，這是難免的，任何一件新事業，總要遭遇到一些阻碍！」

先生很有耐心地與反對的人士接觸，建立私人友誼，然後再慢慢說服他們。

「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是鳥之兩翼、車之二輪，是相輔相成的，尤其是青少年問題漸趨嚴重時，社會上就感到單靠學校教育是難以解決問題的。到了最近，風氣更開，學校也應該辦理社會教育工作，學校成爲一個地方的文化中心與精神堡壘，所以今天再不會有人提起這個問題了！」先生很體諒的述說社會教育系在社會環境中的成長經過。我們更要注意到社教系在短短廿六年內，人才輩出，受到社會大衆廣泛的贊譽，與先生當時的辦學方針具有密切的關係：

- 一、確立辦學目標，使學生知道對社會所負的責任，在求學期間就會具體不含糊，到社會上服務就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 二、課程安排要適當，使學生的潛力得到充分的發展，讓學生經由專業訓練後，對其所擔負的工作具有充分的信心。

- 三、注重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使能應付其所面對的挑戰。社教系學生在一年級不分組，到二年級才依個人志趣選組，但是要進新聞組，必須國文與作文的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以維持一定的水準。

- 四、對教師的選擇嚴格，對老師的要求也嚴格，要求老師嚴教，要求老師嚴考，更要求老師對學生要關愛。因之，他將老師與學生分組，每一個老師指導幾個學生，使學生有歸屬感，有安全感；老師對學生也有深入的了解，師生之間的感情自然融洽。

如坐春風的教學

凡是聽過先生課的學生，都有如坐春風的感覺。先生在「怎樣教學」一書的序文中談到：「教學方法是種藝術。善於教學的教師，好像春風風人，使人樂而忘倦；同時他能夠以人格感化的作用，使學生潛移默化，在不知不覺中，

養成高尚的人格。我們看到一個優良教師的教學，正如欣賞一幅名畫，行雲流水，使人流連忘返；又好像欣賞一曲名歌，餘音在耳，嫋嫋不絕。」其實，這正是先生上課時的最佳寫照。這是一種人格的陶塑，更是諸多經驗的累積，先生談到當一位好老師就應該在下列數項下功夫：

一、本身對教學工作要有興趣，如此才能夠使學生對課業產生興趣。

二、對所擔任的課程要有深刻的研究，講課才能夠深入淺出，學生才能聽得懂，教起書來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語言的自我訓練：如何使語言流暢，有層次、有條理；發音能夠清楚、正確；聲音能夠不高不低，不使學生產生厭倦之感；措辭要簡單明瞭、生動有趣、有條不紊。

四、態度不能太嚴肅，像學生的父母一樣，和顏悅色、和藹可親，使學生感到親切，敢於向教師發問，如此學生才會覺得如坐春風，如果教師的態度嚴肅，學生則有「如坐冬風」的感覺了！

「做老師的，第一要有熱心，第二要真的有學問，有道可傳，第三在語言上要盡力自我訓練，第四在態度上要仁慈和藹，才算是一個理想盡職的教師。」

其次，先生對於教師職務的重要性，亦提出睿智的見解，他說：「教師對於國家負教育國民、培養人才的責任；對於社會負改進生活、轉移風氣的責任；對於學校負推進教育事業、實現國家教育方針的責任；對於學生負教導其思想、行爲、學業和身心攝護的責任。」

因之，先生提出四點願與教育界同仁共勉：

一是發揮誨人不倦的服務精神：對於教學工作，要有宗教家佈道的熱忱。平時熱心指導學生，對於學生課業要認真查考；對於學生言行，要隨時規正。

二是發揮仁愛思想的教育精神：要接近學生，了解學生，更要愛護學生。教師對學生，要有父母對子女的慈愛心

陽。平時教學，也要春風滿面，師生感情相處要能融洽。

三是發揮學而不厭的進修精神：因為教學是一種精微奧妙的工作，雖是訓練有素的教師，也會在教學時遇到困難的問題，所以教師要不斷進修，尤其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如果不隨時充實新知，很快就會落伍。

四是發揮淡泊寧靜的樂道精神：不汲汲求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認清人生的真義和價值，具有安貧樂道的精神，懷抱光風霽月的風度，才能體會教育工作的樂趣。

先生在這四點的實踐可以說是淋漓盡致。除此之外先生特別重視教學方法。

「教學已經成爲一種專門的工作，絕非率由舊章，習成技巧，便可完成樹人的使命，而必須對於教學方法的理論和實際，加以觀察研究，時謀改進。」

因之，先生寫了甚多有關教學法的書籍，如中學教學法、怎樣應用新教學法、普通教學法、怎樣教學、教學法新論、國民中小學教學法之改進……期能改進國內各級學校的教學法。然而經過幾年來的深入考察之後，先生不禁慨歎目前的教學，仍然「偏重於知識的灌注，而忽略思想的啓發、羣性的涵詠，更未遑顧及品格的陶冶！」追根究底，問題的癥結仍在師資，如果每位老師皆受過正規的師資養成訓練，情況就容易改觀了！

對國民教育的貢獻

我國國民教育的發展成效，頗受世界各國矚目，先生即是親自參與其事，投入心力最多的一位。民國四十四年，應國立編譯館之約，主持國民學校國語課本之改編工作，先生乃革新課本內容，以民族精神教育爲主旨，並改進課本的形式和印刷，使之煥然一新。最值得一提的是國小教科書由黑白版到彩色放大版，並有生動的插圖加以配合。除了教科書，還附有作業簿，都是當時很重大的革新。

先生於民國五十二年任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擔任教育方面的設計考核工作，對當時重要的教育規劃，都投下無窮的心力，尤其是九年國民教育的推展，更是戮力以赴，不餘遺力。先生提到九年國教的重要性時說：

「國民教育是一個國家真正全民性的強迫教育，目的在提高國民的素質，對民族信心的建立與民主政治的推行，都有極大的助益。」

九年國教雖有其重大成就，先生並不以此為滿足，認為尙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有：國中課程問題、國中職業選科、教育人事制度、二部制教學的消除、班級學生數的減少等問題。

先生認為國中課程與國小課程缺乏縱的銜接，也沒有橫的連繫，尤其是國中課程，課本內容太過艱深，使大部份國中學生吸收不了，這是老問題，所產生的弊端卻日益嚴重，如何使課程符合時代性，且適合大多數學生研讀，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國中課程應考慮到「不升學」學生的需求，讓他們自由選擇有興趣的學科就讀，或允許其受一些職業訓練，以幫助他們在畢業時能順利的就業。

「國中課程革新了，教材改編了，則因材施教和人盡其才的理想才可以實現，也才能達成統一民族文化及試探學生能力、指導學生分途發展的功能！」

在師資方面，國小教師大都具有專業訓練，應改進入事制度及照顧其發展前途，以激發其教學熱忱；國中教師則應加強其專業訓練，鼓勵其不斷進修。

「課程是教育的內容，教師是達成教育目標的生力軍，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國民教育的目標才能達到，國民教育的功效才能發揮！」

所謂書生報國，念茲在茲，舍先生其誰？

對社會教育的期望

在社會教育方面，先生再次表現出智者的真知灼見，他認為社會教育與國家建設、民族復興具有密切關係，在當前，社會教育有其時代使命，即：

- 第一、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以鼓舞民氣，發揮民力，共同負起建國的責任。
- 第二、轉移社會風氣、挽救社會頹風，建立國民道德生活規範。
- 第三、增進一般國民的公民知識，提高國民的文化水準，訓練國民行使四權的能力，以成爲現代國家的健全國民。

第四、要使離開學校的青少年和成人，獲得繼續教育的機會。

在措施方面，首先要加強傳統社會教育機構的現代使命，使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等隨時代的需要，社會的環境，而作積極有效的配合。第二方面則要發揮新興大眾傳播事業的社會教育功能，使廣播、電視、電影、報紙發揮其教育民衆的功效。第三方面則要加強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配合，使學校肩負起社會教育的使命。

治學嚴謹、著作等身

在大學時代培養出「學不厭、着不倦」的學術研究興趣，使得先生在治學上有特殊的見解。

「治學不是爲了混資格文憑，也不是純爲學問而學問，它的目的在配合整個人生的需要，使得人懂得如何做人、做事，並在服務社會的事業上有良好的表現。」

「寫作是一種興趣，也是一種自我訓練！」

在研究、寫作上，先生雖然歸功於大學時代教授的鼓勵以及同學相互之間的研究風氣，先生在治學上獨特的工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先生強調治學的「四到」，卻有更精闢的闡揚：

「心到」不只是專心，應該是集中注意力去思考書中的見解，研判書中的資料，如此對書本的認識才會透澈。

「口到」也不再是純粹的背誦，更應該包括經常的討論、辯白與相互的啓發。

「手到」是要多做筆記和分類摘要，時時練習組織及發表的能力，以加強思想的深度。

「眼到」除了博覽羣書，還要會利用書目索引，並多多觀察實際，以印證書中的理論。

除了四到之外，「由博返約」也是先生強調的重點，即先打好一般學識的基礎，再作專門學術的探討，如此才能客觀，避免先入爲主的偏見。

先生所出版的書籍六十餘冊，論文三百二十餘篇，都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孕育出來的作品，幾乎所有學教育的人都欽仰先生的言論，其中「教育概論」一書，更爲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大專學校所採用。

樂觀、積極、服務的生活態度

「與其在經濟上留下產業，不如在精神上留下榜樣！」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上，先生表現了宗教家的佈道精神，教育家的樂道精神，說他「立德、立功、立言」，實不爲過。

經過了抗戰時期的艱苦物質生活，先生練就了淡泊寧靜的人生觀，也培養出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在四十年的教席之上，先生的心境依然充滿着年輕人的朝氣和活力，「我永遠以教師爲榮，以教學爲樂！」斑白的髮絲，正透露着智慧的靈光。

民國六十七年，先生把教育部長頒贈給他杏壇四十年的榮譽匾額「菁莪樂育」轉贈給社教系，他說：「我的生命已融入社教系裏！」在社教系的成長、茁壯過程中，無不充滿着先生的精力和心血；眼看着社教系能有今天輝煌的成就，先生臉上的紋路也顯得神聖光彩。薪盡火傳，先生可以說是功在國家，澤被杏壇！

（七〇、四、臺灣教育月刊）